

Essay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inology.

Haikou, china. 1995

华夏文明 传世藏书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6

ISBN 7-5004-1988-0

I. 华… II. 中… III. 汉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20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大街甲 158 号)

诚成(湖南)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6.75 字数:700 千字

定价:51.8 元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留念

1995. 1. 6 中国 海口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到会代表合影

编辑说明

为了加强各国汉学家之间的联系，交流汉学研究的成果，探讨汉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推动汉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合作，于1995年1月5日至9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了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这是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一次规模空前的对话，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的汉学家们与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中国学者共80余人，汇聚一堂，对中国历史、考古、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探讨。经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这次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与会各国学者向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共51篇，反映了国际汉学研究的新成就、新水平。受会议组委会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会后即着手编辑论文集，其工作程序是：先由作者本人进行修订，再由编辑组组织专人编辑加工。与会学者，尤其是外国汉学家，对此项工作极为重视，态度严肃认真，修订字斟句酌。因而历时数月，才完成全书的编辑工作。这里首先应当感谢与会的中外学者为本论文集提供了精心撰写的高质量的论文。

本论文集的编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童超、田人隆、齐克琛、王震中、许敏、陈勇、张彤、史延庭、曲鸣丽、郑剑英等，全部工作由童超主持、田人隆协助。

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刘波先生的鼎力支持，张新奇、张自文等先生也惠予热

情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汤一介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已发表于《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本论文集限于体例，未再收入，特此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编辑组
1995年6月26日于北京

目 录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开幕词	王忍之 (1)
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	陈启能 (4)
文化对话与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乐黛云 (19)
二战以来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研究	谢和耐 (29)
文献、理论和研究者	
——关于中国宗教史研究	葛兆光 (37)
中国历史“中古时代”分期的	
观念问题	陈启云 (54)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学行小记	赵梦溪 (79)
着眼全球，打通中外，把古史研究	
推向前进	王敦书 (94)
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林甘泉 (102)
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血缘解纽	管东贵 (126)
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	周伟洲 (133)
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	刘泽华 (148)
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基本隐喻 (英文)	艾 兰 (161)
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	李根蟠 (186)

中国文明起源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徐苹芳 (223)
中国的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	何兹全 (237)
长江中游文明起源探索	任式楠 (252)
白家聚落文化的彩陶	
——并探讨中国彩陶的起源问题	石兴邦 (285)
“道”、“德”溯源(上)	裘锡圭 (312)
风水探源	田 笠 (319)
王权与祭祀	伊藤道治 (327)
关于殷代雨祭的几个问题	汪 涛 (333)
卜辞中所见宾祭的尸和侑	沈建华 (360)
帛书《易传》《易之义》研究	李学勤 (369)
有关《周髀算经》源流的看法与设想	
——兼论圆方图和方圆图	陈方正 (376)
关于战国时期的性恶说	刘家河 (391)
秦代的国家与其通俗文化的关系(英文)	叶 山 (410)
汉代货币文化的特征	张荣芳 王 川 (441)
司马迁与中国早期作者之概念	方秀洁 (453)
后汉对梦的认识	晁时杰 (471)
禅宗精神	
——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及特点	方立天 (490)
唐代前后的五道将军	杜德桥 (499)
唐代文学的人文精神	董乃斌 (511)
敦煌艺术与礼乐文明	
——莫高窟 285 窟窟顶图象为中心	姜伯勤 (525)
乾嘉汉学论纲	王俊义 (542)
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	陈祖武 (563)
乾嘉汉学再评价	

- 兼评方东树汉学的回应 姜广辉 (570)
- 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 朱维铮 (585)

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暴力在考古学中

- 的反映 王宇信 (604)
- 舜三身与世界创造之完成 韩祿伯 (617)
- 说工 小南一郎 (655)
- 中文大学馆藏建初四年“序宁病简”

与“包山简”——论战国秦汉

- 解疾祷祠之诸神与古史人物 饶宗颐 (662)
- 允姓之戎考

- 兼说大夏的迁徙 余太山 (673)

元代的航海世家澈浦杨氏

- 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 陈高华 (712)
- 清代绅衿阶层婚姻状况的考察 郭松义 (736)
- 袁州李渠(809—1871)与乡绅 斯波义信 (772)
- 清中后期慈善组织的“儒生化”
- 以清节堂为例 梁其姿 (779)
- 吴虞与刑法典论争 小野和子 (788)

世纪之交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壮举

- 评《传世藏书》编纂的重大意义 辛业江 (825)
- 《传世藏书·集库·全上古三代秦汉
- 三国六朝文》整理札记 王利器 (832)
- 精当的版本抉择 审慎的校勘订补
- 《传世藏书》编校抉微 彭明哲 (840)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开幕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王忍之

各位学者、各位来宾：

在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之际，大家企盼已久的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今天隆重开幕了。我代表大会组委会，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莅临这次会议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海南省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不断发展，各门学科、各种专业性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及中国的其他城市经常举行。但是，以“国际汉学研讨会”命名，邀请海内外对中国历史、考古、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各方面研究有素的知名专家学者，荟萃一堂，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学术研讨，这在中国大陆还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次国际汉学研讨会，是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一次空前的盛会。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巨大贡献。国外的“汉学”，正是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增大，国外不少汉学家的研究视野又逐渐移向近代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人们也愈来愈多地使用“中国学”这一新的学科名称。如果说，西方的汉学研究肇始于

16—18 世纪,创始人主要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那末到 19 世纪则有了显著的发展,汉学开始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国外的许多高等学府里占有一席之地。进入 20 世纪之后,国际上汉学的研究更加蓬勃发展,不仅研究课题丰富和多样化,而且在相当多的国家与地区受到本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的是那些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的各国汉学家们,他们克服语言文字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差异等种种困难,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以自己的卓越成就和同中国长期的友好往来,对传播中国文化,增进本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保持友好感情,献身于汉学研究事业的各国汉学家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国历史遗产博大丰厚,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如何总结与继承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历来是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近八十年来文化论争的一个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反对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食古不化的复古主义,而主张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总结,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回顾新中国成立四十五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虽然曾有这样那样的干扰,出现过一些不能苟同的见解,但大体上是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前进的。特别是近十五年,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是开创了蓬勃发展、生意盎然的新局面,各个领域、各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有如雨后春笋,不但数量超过前三十年的总和,质量也有所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台湾学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海峡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这几年来有

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国外汉学研究的不断进步，为中国学者与各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日益广阔的天地。中国学者与各国汉学家所掌握的材料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在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上也不尽相同，因而得出的看法，形成的观点，也不会完全一致，这是正常的。但既然有着共同的专业范围与研究对象，因而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学术交流与合作，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我们举办这次国际汉学研讨会，目的就在于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一次加强联系、交流成果、探讨合作，以期推动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的机会。我们相信，经过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这次研讨会定会取得圆满成功，一定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推进起到良好的作用。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目前北国已是寒风凛冽的严冬，而海南岛则温暖如春，和风拂面，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能在这样气候宜人的地方举行，应当感谢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最后，让我再一次对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尤其是远道而来的海外汉学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欢迎。祝各位代表、各位来宾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谢谢。

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 陈启能

中国学 (Sinology), 又译汉学, 系指海外对中国的综合研究, 一般不把中国本国的研究包括在内。

Sinology 一词有几种不同的中文译名。一是“汉学”, 这是长期以来的习惯译法, 一是坚决反对译成“汉学”, 主张一律改译“中国学”, 就像不久前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的编者所提倡的那样^[1]。还有一种看法认为, “汉学”与“中国学”虽都指海外的中国研究, 但所指的时期和包含的内容各有不同。“汉学”指早期的中国研究, 内容较窄, 所以也常被称为“传统汉学”; 相对而言, 中国学则是“现代中国学”了。并且认为, 这种区别不只是翻译的问题, 而是在海外本来就存在的; “中国学”研究是美国在 19 世纪 30 年代开创的^[2]。如果仅就翻译而言, 笔者倾向于“中国学”的译法,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的编者已就此谈了许多理由, 这里就不赘言了。至于过去译成“汉学”, 可能是同把“汉”或“唐”代表中国的习惯有关。譬如, 国外许多大城市内的 China Town (中国城) 被译成“唐人街”就是类似的例子。不过, 我们更感兴趣的, 不是翻译问题, 而是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

海外中国学,这里主要是指欧美的中国学;日本的中国学,因有其自身的特点,暂且不去说它^[3]。在欧美中国学中,西欧的中国学是最早形成的。它的形成时间,有人说在16—17世纪^[4]。其实说16世纪未免早了一些,因为在16世纪西欧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委实是凤毛麟角,主要是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在罗马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史》。可是,个别著作的出版并不能表明一门学科的形成,譬如,由马可·波罗口述写成的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完成于13世纪末,我们并不能据此把西欧中国学形成的时间再推前两个多世纪。因此,把它定在17世纪似更为合适,更确切些说,应是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因为,在这段时间,在西欧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著作,也出现了一些研究家。这一时期的著作大多出于西欧到过中国的传教士之手,其中以法国为主。1814年,在法国的大学里,开始讲授中国问题,并出现了第一位中国学的教授。19世纪上半叶,法、英先后成立了“亚细亚学会”,并陆续发行会刊。

俄罗斯的中国学晚于西欧,最初有关中国的一些著作出自外交家和传教士之手。虽然在17世纪时,已有一些外交家写过这类著作,但当时没有出版,有的拖至18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才出版。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中国学有了明显的发展。喀山大学于1837年,彼得堡大学于1855年分别建立了汉语、满语教研室。还出现了像Н·Я·比丘林(1777—1853年)这样有名的汉学家。但当时还是以翻译为主,并且比较偏重中亚、中国的东北、西藏、蒙古和宗教等。

美国的中国学形成更晚,在19世纪30年代,主要受西欧的影响。当时,美国的中国学无论在内容、目的,还是方法方面,都与西欧的中国学没有多大差别。因此说美国开创了不同于西欧“汉学”的“中国学”,根据似嫌不足。唯一不同的是,美国人运用了Chinese Studies一词。不过这词的普遍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并有逐渐取代 Sinology 一词的趋势。

欧美的中国学，尤其是西欧的中国学，到 19 世纪下半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综合学科。这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的改变，强调对中国的史料作科学的考证，要求研究成果要建立在可靠的材料基础上。其次表现在关于中国研究的人才培养和教学课程的改进。这时西欧一些主要大学均采取了这类措施，如英国牛津大学于 1876 年、伦敦大学于 1877 年、剑桥大学于 1888 年，法国东方现代汉语学校于 1881 年，德国汉堡大学于 1909 年，相继开设了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课程。这时，在欧美中国学中，西欧成为重要的基地和研究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中心开始向美国和苏联两极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渐取代 西欧成为西方中国学的中心。苏联的中国学则沿着不同于西方中国学的道路发展。

二

以上是对欧美中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发展所作的简单叙述，下面要对它的发展趋势，主要是就其研究内容而言，作些分析。这应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如果从这个方面分析，笔者认为，可把海外中国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50 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一时期，可笼统地称为“传统中国学”（或按习惯称为“传统汉学”亦无不可）；后一时期则为“现代中国学”。

前一时期，即“传统中国学”时期，历时三百多年，其间自有不少变化，但却有一些总的共同特点，兹简述如下。

首先，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偏重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语言、宗教等人文科学学科，对中国的古典时期往往很感兴趣。很多汉学家对中国的古典作品相当熟悉，古汉语也较精通，但却不大擅长现代口语。这些当然都不是绝对的，但无疑是主要特色，尤其对西欧中国学的传统来说更是如此。

其次，从对中国的整个观念来看，如果说在早期，由于西欧对中国的了解还很有限，同时西欧本身还比较落后，因此常以好奇的眼光和赞美的心情，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先进的大国的话，那末，从18世纪以来，由于欧洲的多数国家逐渐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与仍然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随着它们海外扩张政策的加速推行，并终于在19世纪中叶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紧锁的门户，它们对中国的看法也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看法带着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也就是以西方的历史变化和价值取向为准绳来看待中国的历史，认定中国社会是停滞不前的，只能在传统的模式里循环往复，至多只有微小的量的变化，唯有西方的冲击才能改变这种僵化状态，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具体到中国社会，往往被说成是似乎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国家，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没有大地产和大地主阶级统治，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这个时期海外中国学的传统看法。

再次，从研究方法看，至多停留在实证主义的史料考订的水平。

对以上这些特点，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看法。毫无疑问，欧美的传统中国学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它的西方中心论和研究范围的狭窄。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看不到长期以来欧美中国学所取得的成绩和许多严肃的欧美中国学家所做的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应该看到，由于欧美列强对中国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因而使这个时期的中国学带有明显的为侵略需要服务和对中国抱有歧视偏见的特色，西方中心论便是其集中的表现。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强大，不要说那些西方殖民政策的代言人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就是众多中国学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就是一个例子，他提出的解释中国近代史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在他看来，西方的入侵是19世纪中国

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自我平衡的社会,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反应才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近代化过程。虽然费正清后来也意识到,这种传统观点必须放弃⁽⁵⁾,但这足以说明西方中心论对欧美中国学影响之大。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虽然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但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要真正透彻了解中国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的。而要把自己了解到的中国的情况介绍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则更是难上加难了。费正清在晚年曾说过:“我做为一个为美国读者写作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 62 年了,即便如此,我依然无法肯定该如何叙述中国文化。”⁽⁶⁾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事实也确是如此。要克服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深入地客观地了解和研究中国,并把它如实地向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介绍出来,确实是一个需要艰苦努力的长期积累的发展过程,这同时也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过程。开始时,更多地学习不熟悉的语言,翻译中国的古典作品,编纂辞典和了解历史文化背景,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没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很难设想的。正是经过许多代学者的不断努力,海外的中国学才一步步地发展起来,并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和帮助海外广大读者了解中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是应该充分予以肯定的。自然,在这中间有种种的局限性,其中有的是属于发展中的局限性,有的则是诸如西方中心论这类较为严重的偏见,有的甚至直接为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扩张政策张目。这里的关键是,海外的学者在研究不同于自身文化背景的中国时,能否持一种平等的、科学的、客观的态度,既不抱猎奇的心理,更不持居高临下的歧视态度,同时要排除政治的干扰,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冷静的、科学的、严肃的研究工作。至于具体的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和争论,则是研究